

「目 录 学 发 微」

老北大讲义



重访老北大·敬聆大师言

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；
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；
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；
因为有了这套讲义，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！

目录学发微

余嘉锡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目录学发微/余嘉锡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(老北大讲义)

ISBN 978-7-5387-2560-5

I. 目... II. 余... III. 古籍—目录学—研究—中国 IV. 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6685 号

目录学发微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作 者 | 余嘉锡 著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选题策划 | 张四季 |
| 责任编辑 | 陈 琛 |
| 特约编辑 | 秦千里 苗欣宇 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
邮编: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-86012726 发行科: 0431-86012939 |
| 网 址 | www. shidaichina. 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开 本 |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350 千字 |
| 印 张 | 13 |
| 版 次 |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14.0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老北大讲义》出版说明

自1898年建校以来，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，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。我们很难在“重镇”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，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，那么，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：教育、学术、思想、文化传承；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，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——心目中。

因此，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，或许是这个样子的——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、学术、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。

从语法的角度来看，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，它的定语功能越弱，因此，这个“心目中”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——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？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？

确实如此，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，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之前，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、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。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“五四”时期的红楼，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——但好在，校址课堂可以变换，教授先生可以逝去，但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，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。事实上，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，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、先贤与遗产呢？

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，就是这样与我们“心目中”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，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——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。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，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。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：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、科学、专

业、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，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。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“学校”的本质精神，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，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“勇气”二字，因为，他们面对的是启蒙。

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、科学、专业、正直，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，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原因似乎很简单：它只为良知负责，而不掺杂任何功利；原因却也很复杂：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。因此，我们很难想像，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，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，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，依然能够熠熠闪光。

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：“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之义。”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，是北大的教育准绳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，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。正是本着这种精神，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：

其一，它涵盖了文学、史学、艺术、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。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“跨学科”，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；

其二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，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。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、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。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；

其三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，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，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；

其四，即或放在今天，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。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，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。

正因为如此，《老北大讲义》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，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。因为有了李大钊的《史学要论》，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；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，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；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，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……

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，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，这套《老北大讲义》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，轻易地在我们脚下

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。

然而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，看似轻易简单，实则困难重重。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，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，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，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，因此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

此外，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，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。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，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，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“老北大讲义”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，所以，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“旧作”。

而其中最大的困难，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，出版本十分罕见。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，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，不日将陆续付梓——在兴奋与欣喜之余，我们也不免惧怕，如果再不出版，它们，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，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。

正因如此，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，能够延续我们“心目中”的那座殿堂，否则，很难说再过百年后，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，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。

编 者

2009年3月

关于本书与作者

余嘉锡（1884～1955），目录学家、语言学家、史学家。1918年，余嘉锡从湖南老家来到北平，继而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各大学主讲目录学。1931年，他任辅仁大学教授，兼国文系主任。1942年冬，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48年，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》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。解放后，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。

余嘉锡对传世典籍阅读之广、钻研之深、分析之细微、考辨之切当，都是超越前人的。他一生治学的主要方面就是继承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，以目录学为治学角度，重视掌握目录以求博通群书。他一生读书涉猎极广，自称“史、子两部，宋以前书未见者少；元明以后，亦颇涉猎”。而对目录学的研究，缘于他16岁读了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领悟到做学问应从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入手。于是，17岁时便开始考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撰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》24卷，辨订古籍近500种。这本五十余年创作的八十万字巨著，声振国内外，被誉为“是一部从微观角度研究我国古籍的巨著”。此外，他的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《汉书艺文志索隐》以及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等，都是学界影响巨大的论著。

《目录学发微》是余嘉锡的在目录学领域的主要著作，为他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目录学的讲义。书中广泛利用中国历代学者在目录学方面的论著，对目录学的意义、功用和源流，对目录的体例和类例的沿革，都做了精辟论述，并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，认为在目录体例中，篇目、小序、叙录、版本、序跋等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，才能发挥出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的作用。

书中附有另一篇目录学专著《古书通例》，原名为《古籍校读法》，

亦是目录学课程的讲义。介绍了古籍在著录、体例、编次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，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。但全书未完成，1985年重新出版时改名为《古书通例》，沿用至今。

余嘉锡先生的治学影响了一代学人，著名历史学家周祖谟先生是他的女婿，而据说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的张舜徽（1911~1992）竟是靠旁听他的课程学有所成。当代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先生是当年北大听课的弟子，他回忆说，“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，他参加过修《清史稿》。他讲湖南话，一开学就可以拿到他的讲义，一本订好的，不用钱。他讲的内容如果用心看书也可以明白，都差不多的，不过有时讲课会举点例子。”

而张中行先生也是他的学生之一，他回忆说，“他（余嘉锡）身材中等偏高，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。当然穿长袍，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、马叙伦相比，还多一顶瓜皮小帽。上课坐着讲，平静地传授知识，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。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，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。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，治旧学，思路清楚，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……今代盛行大话和空话，前现代、后现代之类，丈二和尚，使人摸不着头脑，对比之下，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。”

余嘉锡先生去世后，其后人将其藏书捐赠给北大历史系，现藏于中古史研究中心图书馆，约有18000余册。这些书中保留了大量余嘉锡先生的批注，极具收藏与研究价值。

目 录

目录学发微

卷一 目录学概览

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/2

目录释名/12

卷二 目录书体制

篇 目/22

叙 录/27

小 序/41

版本序跋/51

卷三 目录学源流考

周至三国/58

晋至隋/65

唐至清/79

卷四 目录类例

目录类例之沿革/92

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/111

古书通例

绪论/117

卷一 案著录

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/122

古书不题撰人/130

古书书名之研究/136

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/141

卷二 明体例

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/152

汉魏以后诸子/161

古书多造作故事/165

卷三 论编次

古书单篇别行之例/176

叙刘向之校讎编次/179

古书之分内外篇/185

卷四 辨附益

古书不皆手著/192

目录学概览

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

目录之学，由来尚矣！《诗》《书》之序，即其萌芽。及汉世刘向、刘歆奉诏校书，撰为《七略》《别录》，而其体裁遂以完备。自是以来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。治学之士，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，较其他学术，尤为重要。今欲讲明此学，则其意义若何，功用安在，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。

《隋志》言：“刘向等校书，每一书就，向辄别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叙而奏之。”章学诚所谓“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也。《校讎通义》叙。其后作者，或不能尽符斯义，辄为通人所诋诃。虽自《通志·艺文略》目录一家已分四类，总目、家藏总目、文章目、经史目四类。继此枝分歧出，派别斯繁，不能尽限以一例，而要能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，昔人论之甚详。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。吾国学术，素乏系统，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，各家类然，而以目录为尤甚。故自来有目录之学，有目录之书，而无治目录学之书。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，久而心知其意，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。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大抵默喻诸己，未尝举以示人。今既列为学科，相与讲求，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，及其体制若何，方法若何，胥宜条分缕析，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，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，省搜讨之力，即他日从事著作，亦庶几有成轨可循。今之所讲，其意盖在于此。

目录之书有三类：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，书名之下有解题者；书名下论说，名称屡变，详见后《目录书体制》。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，姑用以立说。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；三曰小序解题并无，只著书名者。昔人论目录之学，于此三类，各有主张，而于编目之宗旨，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，则无异议。今取诸家之说，分类撮举之于下。

属于第一类者，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晁、陈书目，《通考·经籍考》《四库提要》之类是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簿录类》论云：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以为纲纪。体制湮灭，不可复知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诗，亦皆相类。其实齐、鲁诗亦皆有序，清儒马国翰、陈寿祺诸家所辑《遗说》可考，此因齐诗魏代已亡，鲁诗亡于西晋，故但举毛、韩二诗耳。汉时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条

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寻事迹，疑则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后，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。博览之士疾其浑漫，故王俭作《七志》，阮孝绪作《七录》并皆别行。大体虽准向、歆，而远不逮矣。”

观《隋志》之持论，掎击诸家，推尊向、歆，盖以向之《别录》，每书皆有叙录，歆之《七略》，群篇并举指要，于书之指归讹谬，皆有论辨，剖析条流，至为详尽，有益学术，故极推崇。荀勖《中经簿》，上承《七略》，下开四部，至为重要，而《隋志》谓其“但录题及言，盛以缥囊，书用细素，至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辨”。其于勖之不满，溢于言表。此后自东晋义熙，以及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并有官撰目录，而为书皆只数卷，并不著解题，所谓“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”。至王俭依据《七略》，《玉海》卷五十二引俭序云：“今依《七略》更撰《七志》。”阮孝绪斟酌王、刘，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《七录序》云：“今所撰《七录》斟酌王、刘。”是皆取法前修，宜可免于讥议。然于《七志》，则谓其“不述作者之意，但于书名之下，每立一传。……文义浅近，未为典则”。于《七录》，则谓其“分部题目，颇有次序，剖析辞义，浅薄不经”。由是言之，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，固薄其浑漫，视为无足重轻；即有解题者，若其识解不深，则为美犹有憾。盖王俭之志，惟详于撰人事迹，于指归讹谬，少所发明，阮氏《七录》，或亦同之。故虽号博览之士，卒难辞浅薄之诮。观其一则曰“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辨”，再则曰“不述作者之意，未为典则”，则知凡目录之书，实兼学术之史，账簿式之书目，盖所不取也。唐时目录家，如毋煚、释智昇之徒，其所主张，率同斯旨。

毋煚《古今书录序》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“夫经籍者，开物成务，垂教作程，圣哲之能事，帝王之达典。去圣已久，开凿遂多，苟不剖判条源，甄明科部，则先贤遗事，有卒代而不闻，大国经书，遂终年而空泯。使学者孤舟泳海，弱羽凭天，衔石填溟，倚杖追日，莫闻名目，岂详家代，不亦劳乎！不亦弊乎！将使书千帙于掌眸，披万函于年祀，览录而知旨，观目而悉词，经坟之精术尽探，贤哲之睿思咸识，不见古人面，而见古人心，以传后来，不愈其已。”

释智昇《开元释教录序》：“夫目录之兴也，盖所以别真伪，明是非，记人代之古今，标卷帙之多少，捃拾遗漏，删夷骈赘，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也。”

宋王尧臣等作《崇文总目》，每类有序，每书有释，盖祖向、歆之

成规。郑樵作《通志·校雠略》，乃极不满之，谓其文繁无用。清初朱彝尊得《总目》钞本于天一阁，已无序释，因为之跋，归狱于樵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即用其本著录。《提要》信朱氏之说，所以罪樵者尤至。虽其考证不免谬误，然可见编录书目，均当有解题，乃为尽善也。

朱彝尊《曝书亭全集·崇文总目跋》：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四十四。“《崇文总目》当时撰定诸儒，皆有论说。凡一书大义，为举其纲，法至善也。其后若《郡斋读书志》《书录解题》等编，咸取法于此。故虽书有亡失，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，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。范氏天一阁有藏本，展卷读之，只有其目，当日之叙释，无一存焉。乐平马氏《经籍考》，述郑渔仲之言以排斥诸儒，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，嫌其文繁无用。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，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。”案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八十四《崇文总目提要》：“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。逮南宋时，郑樵作《通志》，始谓其文繁无用，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刘歆《七略》而作，班固已有自注。案欲驳郑樵之说，当详考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之体例。今只举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为说，不知樵说正是根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是仍不足以服樵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参考《七录》，互注存佚，亦沿其例。案《隋志》佳处在每类之序论。若只每书下注存佚，则其文亦已略矣。《唐书》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，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。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，实缘于此，不可谓之繁文。郑樵作《通志》二十略，务欲凌跨前人，而《艺文》一略，非目睹其书，则不能详究原委，自揣海滨寒畯，不能窥中秘之全，无以驾乎其上，遂恶其害已而去之。此宋人忌刻之故智，非出公心。厥后脱脱等作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纰漏颠倒，瑕隙百出，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，是即高宗误用樵言，删除序释之流弊也。案《宋志》之丛脞，与郑樵绝不相干。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，晁氏、陈氏二目，诸家藉为考证之资，而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及此书，则若存若亡，几希湮灭。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。”《崇文总目》之无序释，与郑樵初无关系。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，钱大昕《养新录》卷十四考之尤详。

又《直斋书录解题提要》：“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，各详其卷帙多少，撰人名氏，而品题其得失，故曰解题。古书之不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伪，核其异同。亦考证之所必资。”

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，必从此问涂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然此事非苦学精究，质之良师，未易明也。自宋之晁公武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，皆学识未高，未足割断古书之真伪是非，辨其本之佳恶，校其讹谬也。”

孙诒让《温州经籍志叙例》《籀述林》卷九：“中垒校书，是有别录，释名辨类，厥体纂详。后世公私书录，率有解题。自汉宋之《崇文》，逮熙朝之《四库》，目诵所及，殆数十家，大都繁简攸殊，而轨辙不异。而于篇题之下，叠逢叙跋，目录之外，采证群书，《通考》经籍一门，实创兹例。朱氏《经义考》祖述马书，益恢郭郭。观其择擅群艺，研核臧否，信校讎之总汇，考镜之渊藪也。”

王先谦《郡斋读书志叙》见王刻本卷首：“史志仅列诸目，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，并其人之姓字里居，生平事迹，展卷粲列，资学者博识尤多。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，按此学之从来远矣，非晁氏所创。即就有宋一朝言之，亦先有董道之《广川藏书志》，并不始于晁氏也。陈氏振孙继之，并为后儒所宗仰，而晁氏尤冠绝。”

以上所举诸说，其意大要有六：一、述作者之意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二、览录而知旨，观目而悉词。不见古人之面，而见古人之心。毋甕三、一书大义，为举其纲，书有亡失，览其目录，犹可想见本末。朱彝尊四、品题得失，藉以求古书之崖略，辨今书之真伪，并核其异同。《提要》五、择擅群艺，研核臧否，为校讎之总汇，考镜之渊藪。孙诒让六、阐明指要，资学者博识。王先谦凡此诸说，所以明目录学之功用详矣。然皆指有解题者言之也。

属于第二类者，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也。然《汉志》本之《七略》，《七略》原有解题，班固删去之，而但存其《辑略》之文，散入各家之后以为之序，此特欲删繁就简，非以解题为无用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因之。至于小序之作法，则章学诚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二语尽之矣。

章学诚《校讎通义》序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、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。”

又《原道篇》一之二：“刘歆《七略》，班固删其《辑略》而存其

六。颜师古曰：‘《辑略》，谓诸书之总要。’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。此最为明道之要，惜乎其文不传。今可见者，惟总计部目之后，条辨流别数语耳。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，即是刘歆《辑略》。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，误甚。即此数语窥之，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。”

又《互著篇》三之一：“古人著录，不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如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则一掌故令吏足矣，何用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，仅乃卒业乎？案此语亦误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刘向校书，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，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，皆言“所校某书若干篇，除重复定著若干篇，已杀青，书可缮写”。是校讎已定，书可缮写之时，乃作一录，故其事不得不缓。今乃言古人著录，“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”，若向、歆两世相继，仅成一书目者，亦可笑矣！盖部次流别，申明大道，叙列九流百氏之学，使之绳贯珠联，无少缺逸，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。古人最重家学，叙列一家之书，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，无不穷源至委，竟其流别，所谓著作之标准，群言之折中也。”

又《补校汉书艺文志篇》十之二：“汉志最重学术源流，似有得于太史叙传，及庄周《天下篇》、荀卿《非十二子》之意。此叙述著录，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，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。”

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二：“刘中垒父子成《七略》一书，为后世校讎之祖。班志撮其精要，以著于篇后。谓小序。惟郑渔仲、章实斋能窥斯旨，商榷学术，洞彻源流，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，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，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。……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为目录，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。多识书名，辨别版本，一书估优为之，何待学者乎？”

案据《风俗通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，释校讎之义，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详见后《目录书体制》。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，渔仲、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，而目为校讎，命名已误，朱氏之说非也。特目录不专是校讎版本耳。

章氏著《校讎通义》，盖将以发明向、歆父子校讎之义例，然于向、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，仅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参互钩稽而为之说。故其言曰：“刘歆《七略》亡矣，其义例之可见者，班固《艺文志》注而已。”《互著篇》三之二。夫《七略》《别录》虽亡，其逸文尚散见于诸书。章氏时，马国翰、洪颐煊、姚振宗辑本皆未出。章氏不长于考证，故未能搜讨。况刘向

校书叙录，今尚存数篇，即《别录》也。说见后。章氏仅知其校讎中秘，有所谓中书、外书、太常书、太史书、臣向书、臣某书，《校讎条理篇》七之二。而于录中立言，所以论其指归、辨其讹谬者，不置一言，故其书虽号宗刘，章氏书第二篇名《宗刘》。其实只能论班。其所最推重者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。其所谓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者，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，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。不知刘向之《别录》，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。然章氏书虽多谬误，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，往往发为创论，暗与古合。即此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二语，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。以《隋志》及毋煚之说考之，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，盖天下之公言也。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。

属于第三类者，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唐、宋、明《艺文志》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《书目答问》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。此类各书，不辨流别，但记书名，已深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讥，然苟出自通人之手，则其分门别类，秩然不紊，亦足考镜源流，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，郑樵所谓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，不可忽也。

郑樵《通志》卷七十一《校讎略·编次必谨类例论》：“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。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。人有存歿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以今之书校古之书，百无一存。其故何哉？士卒之亡者，由部伍之法不明也；书籍之亡者，由类例之法不分也。类例分，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，虽亡而不能亡也。”又曰：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，以其先后本末具在。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，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。讖纬之学，盛于东都。音韵之学，传于江左。传注起于汉、魏，义疏盛于隋、唐。睹其书，可以知其学之源流。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，是为新出之学，非古道也。”

又《编次必记亡书论》：“古人编书，必究本末，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袭。故学者亦易学，求者亦易求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，最为详明。凡作历者几人，或先或后，有因有革，存则俱存，亡则俱亡。唐人不能记亡书，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，必使具在而后已。及崇文四库，有则书，无则否。不惟古书难求，虽今代宪章亦不备。”

又《编次失书论》：“书之易亡，亦由校讎之人失职故也。盖编次之时，失其名帙。名帙既失，书安得不亡也。”